

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圖景*

陳 偉

[提 要] 灣區建設顯然不能止於單維的經濟產業帶,其本質應該是基於經濟發展的區域性社會系統再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增強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從而共建人文灣區,由此將軟實力建設上升到能否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戰略高度。要增強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首先就要釐清並把握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狀況。事實上,軟實力經典思想設定了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軟實力建設的學理條件及其終極目標與直接目標,以此為基礎,同時結合世界四大灣區的發展經驗,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圖景主要應該包括:文化、營商環境、生態環境與人口素質。這一圖景描繪有助於正本清源,同時能夠為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提供智庫支持。

[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軟實力 文化 人文灣區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4-0032-12

灣區經濟是當今國際經濟版圖的突出亮點,但灣區建設顯然不能止於單維的經濟產業帶,其本質應該是基於經濟發展的區域性社會系統再構建。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正式出台與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的遠期目標是到 2035 年。其時,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從而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①可見,軟實力建設在此已上升到能否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戰略高度。

如何增強大灣區軟實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釐清並把握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狀況。遺憾的是,當下軟實力理論研究並沒有完成嚴格意義上的學科構建,對很多相關問題都探討不足或存有異議。這其中,與本文主題相關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有着怎樣的相互關係?對此,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麥克心有存疑,認為無法確定軟實力就是一個從硬實力中分離出來的現象,也許它不過是硬實力的光暈,是劍上微光。^②約瑟夫·奈也指出,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往往存在很多共通之處。^③本文撇開這一爭議性問題,僅根據現有的軟實力經典概念與思想,試圖釐析並勾勒出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圖景,為大灣區軟實力建設提供智庫支持。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西方文化軟實力思想經典文獻整理與中國文學外譯話語體系建構研究”(項目號:19BYY100)的階段性成果。

一、軟實力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接口

粵港澳大灣區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區域經濟學概念，而是一個足以帶動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的政策性增長極。^④為此，《規劃綱要》既在發展目標的宏觀戰略角度，又在“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的微觀路徑角度，引入軟實力因子並強調軟實力建設的意義。那麼，軟實力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學理接口在哪裡呢？

1. 軟實力維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學理條件

軟實力是與一個國家綜合國力中表現為經濟力、科技力、軍事力等硬實力相對照的概念，其作用機制靠的是吸引力，而不是強制力，來影響並塑造他人意願，從而有可能改變他人立場，最終得償所願。^⑤與硬實力相比，軟實力絕不軟弱，對一個國家而言，正如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說，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⑥為此，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甚至將軟實力列為衡量大國身份的“四標誌”之一。事實上，在當今國際政治框架中，軟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內容。作為一種新型國際政治理論，軟實力理念的原初落腳點是國家層次的軟實力，後來學術共同體沿着這一領域進行了縱向的外延拓展研究，應用到區域（城市）、組織（企業）、個人等領域，逐步建構起一個整體、動態生成的軟實力縱向研究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根本上在於形成一種區域性力量，因而屬於區域軟實力研究的範疇。這就構成了本文從軟實力維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學理條件一。

根據軟實力經典概念，軟實力必須經由軟實力要素或資源轉化而產生。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來自能產生吸引力的資產，並將這種資產概括為三種，即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⑦作為一種抽象吸引力，軟實力的構成要素無疑會有很多，學術共同體對此也論述紛紜。Tatjana Sehic 認為，軟實力來自於外交、文化與歷史。^⑧塞繆爾·亨廷頓則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加願意追隨其領導。^⑨縱覽這些觀點，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資源“三分說”顯然更具概括性。這其中，文化又是軟實力資源中的核心要素，是靈魂。王滄寧指出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嶄新概念，由此確立了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基礎性地位。^⑩美國經濟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也認為，今天真正佔主導地位的資源以及絕對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土地和勞動，而是文化。^⑪就本質而言，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觀、歷史和外交政策其實都是一國文化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具體表徵。可見，所謂軟實力就是文化軟實力。這就構成了本文從軟實力維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學理條件二。

2. 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終極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問題必須統一到國家整體戰略中觀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軟實力在全球傳播與影響的不足，嚴重滯緩了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軟實力的同步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復興的一個逼切現實問題。為此，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實施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命題。次年，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 Joel Wuthnow 博士發文指出，軟實力建設已經成為中國大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⑫2009年，國務院出台《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提出實施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具體舉措。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文化軟實力是重要國力”的觀念。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做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形成國家軟實力”的重點闡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由此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新嘗試，因而更要有軟實力的助推

或支撐。由此，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正是國家軟實力開發的區域落實，遵循“必須體現國家軟實力的開發方向，落實和提升國家軟實力開發的內容”的區域軟實力建設宗旨。^⑬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軟實力建設的終極目標，即在國家層面上提升國家的整體軟實力與綜合國力，並通過加強民心相通，推動國家“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其他國家戰略的實施。

3. 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直接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國對進一步改革開放問題的最好回答。以文化為基礎的軟實力具有行為能力，既能產生創新力與發展力，又能潛移默化地產生吸引力與凝聚力。因此，粵港澳大灣區開展非強制性的軟實力建設，從而“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既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的一種具體行為方式，也是全面建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的現實需要。這後者包含的發展目標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軟實力建設的直接目標。如果對照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種區域性經濟發展戰略的本質，這直接目標涉及的“宜居”、“宜業”與“宜遊”之間可能呈現出權重與覆蓋面的差異：外層是旅遊，覆蓋面最廣，但權重最小；中間層是就業/生活；內層是投資/貿易，覆蓋面最窄，但權重最大。這就是說，伴隨着以文化為基礎的軟實力建設的推動，軟實力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帶動和支撐作用會越來越大，大灣區文化軟實力會隨之增強，順次形成“宜遊”、“宜居”的條件，並逐漸吸引灣區外尤其是境外的優秀人才與資金，從而實現“宜業”的經濟建設目標。其實與硬實力相比，軟實力在開放市場方面至關重要。^⑭

綜上，軟實力發展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邏輯條件，同時也從學理上決定了後者的終極目標與直接目標。以此為基礎，同時結合世界四大灣區的發展經驗，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圖景主要應該包括：文化、營商環境、生態環境與人口素質。文化資源是軟實力的核心要素，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當然離不開對本地優質文化資源的利用與改造。事實上，《規劃綱要》中71處提到“文化”一詞。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一流營商環境就本質而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觀、法律、外交政策等在經濟領域的具體表徵，因而是一種重要的軟實力資源。《規劃綱要》在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重點要求“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以期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生態環境是指氣候、自然資源、城市景觀等硬環境，是人類社會產生與繼續存在的基礎。它反映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係，本質上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因而也是一種重要的軟實力資源。《規劃綱要》將建設“生態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確定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目標之一，同時以整個第七章“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分析強調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對於促進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人力資本是灣區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國際競爭力的堅實基礎。^⑮國民能力與素質不僅是灣區經濟建設的動力源，也是灣區文化精神和氣質的綜合體現，因而人口素質本質上是一種活態性軟實力要素，能夠更為有效地促進一個國家或地區軟實力的提升。《規劃綱要》在第八章“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中要求“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堅持以人才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可見，《規劃綱要》作為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其實在篇章結構中已經凸顯出文化、營商環境、生態環境與人口素質等軟實力要素的重要性，體現出自身的前瞻性與科學性。

二、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文化資源

軟實力資源自身只是設定了一種介質或可能性,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能通過轉化而產生軟實力。按照約瑟夫·奈的要求,作為軟實力提升動力機制的核心要素,文化只有“在其能發揮魅力的地方”,才有可能轉化為實際吸引力。^⑩這是對文化資源提出的質的要求,“能夠成為軟實力的文化一定是先進的文化”。^⑪先進、優秀的文化既不會抱守是“人類最優秀文明”的妄斷而唯我獨尊,又堅持人類追求的文化的共性與統一性,注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情感。這樣的文化資源能夠激發基於現代文明的人性共鳴,有助於靜水流深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狹隘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可能產生軟實力”。^⑫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基於“文化”資源主要涉及三個維度:

1. 聚焦優秀傳統文化

根據軟實力經典概念,作為軟實力核心要素的“先進、優秀的文化”,其實預設了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屬於自己的文化;二是先進、優秀的文化。這就為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在路徑上做了學理設定,即堅定文化自信,走整合創新之路。

(1) 堅定文化自信。文化符號系統具有標識和提示功能,能夠將一文化區別於他文化,這是文化形成軟實力的邏輯前提。^⑬也就是說,只有聚焦本國或本區域的優秀傳統文化,本國或本區域軟實力才有可能得到提升。在當下傳統文藝復興和國家文化對外輸出的年代,拷貝西方文化藝術形態的文化虛無主義與文化傳承無關,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的精神與力量,更生發不了國家文化的魅力與吸引力。同理,對於區域軟實力建設而言,必須全面發揮包括區域文化傳統、區域文化風俗等在內的區域文化資源的優勢功能。^⑭可見,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聚焦嶺南優秀傳統文化,生發屬於自己的文化力量。

作為母體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在塞繆爾·亨廷頓看來,20世紀90年代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正是由於政策上“重新推崇傳統中國文化”,通過借助“中國文化獨特性提供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而獲得的。^⑮傳統嶺南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當中最具地方濃郁特色和活力的組成部分之一,是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或地區交流與發展的文化基礎、文化特色與文明品牌。這些不同城市有着基於地緣、史緣、親緣關係的不可分割的深刻人文價值鏈,同以嶺南文化為根本,移民文化、華僑文化、客家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了豐富而燦爛的文化遺產。這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源具有統一性,可以協同發展,成為構建“人文灣區”的重要基礎。同時,這一區域文化異質性的獨特魅力與獨立品格,能夠讓其成為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也為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軟實力建設提供良好基因與豐富資源;從僑鄉文化、騎樓建築、嶺南園林到粵劇、武術、醒獅等,都表現出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推陳出新的發展態勢。可見,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堅定文化自信,表現手段就在於擦亮“嶺南文化”招牌,最終目的則在於打造大灣區的新時代文化空間。

(2) 走整合創新之路。整合創新表徵的是粵港澳大灣區聚焦傳統文化開展軟實力建設的方法論。其邏輯有兩點:第一,傳統文化有着品格缺陷性;第二,傳統文化有着歷史局限性。這就是說,傳統文化中有着許多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東西。^⑯沈壯海認為,文化自信雖以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為重要內容,但其基點卻應牢牢地立在當下,因為在文化發展中,只有現實的、生動的當下實踐,才是唯一的活水源頭。^⑰傳統文化的現代性當然是指其適應現代文明規範的程度。在 Joseph Nye 看來,在信息時代,國家有可能獲得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該國的主導文化和理念更接近於普

遍性的全球規範”，²⁴其中的原理正如有學者所說，一國的文化越是具有全球普適性，它就越能夠為主宰國際行為規範而建立起有利於自己的準則和制度。²⁵這就是說，只有當一國的文化中包含了普適價值觀念，雙方才能建立一種兼具吸引力和責任感的關係，該國得償所願的可能性也就會相應地大大增加。²⁶軟實力的核心正是在於文化價值認同。

嶺南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從考古文物到各種文化藝術，既深刻浸淫了本地社會發展的歷史性內涵，也承受了外來文化的融合與洗禮，最終積澱形成了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的深厚底蘊，不但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然而，嶺南文化中也有着糟粕、不健康成分，更有着不合時宜、不符現代文明的東西。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要有對自身文化的自覺，勇敢跳出歷史傳統與意識形態圈囿，站在現代性高度，反思、批判並前瞻性審視、詮釋並確定嶺南傳統文化，吸收其既具有歷史價值、又具有現代普適價值的精華，實現嶺南文化基於歷史性資源稟賦的當代創新改造與釋放，在世界範圍內確立嶺南文化的嶄新形象。為此，《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聯合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保護，合作舉辦各類文化遺產展覽、展演活動，保護、宣傳、利用好灣區內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協同合作，推動嶺南文化光彩的當代煥發。

2. 打造先進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人文精神，由信仰、思想和知識構成。精神文化是區域或城市文化的獨特內核，體現的是該區域或城市主體市民共同的使命、價值觀和理想追求，從而代表着該區域或城市的整體形象與精神風貌，引領該區域或城市的未來發展。

沈壯海指出，能夠成為軟實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²⁷精神文化的魂就是其蘊含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代表着一個地區或城市不同的發展理念與精神風貌。然而，價值觀只有“無論在國內外都能付諸實踐”時才能贏得利益相關方的認同，進而影響利益相關群體的行為。這是對精神文化提出的先進性訴求。先進的精神文化能夠反映時代需要，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與環境價值觀，從而發揮凝聚社會力量的作用，最終贏得國內外社會的廣泛支持。舊金山灣區正是依靠多元包容、開放前衛、鼓勵創新的精神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的科技人才，從而發展成作為世界科技中心的經典模範。東京灣區開發建設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堅持開放性和國際性的精神文化，使得整個灣區的發展始終緊跟甚至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必須體現全球視野、國家視野和域際視野”，²⁸並由此打造屬於自己的先進精神文化。

(1) 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我國現代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制度相適應，因而成為凝聚全社會意志和力量的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體現，也是社會政治制度軟實力的體現，是開發文化資源、建設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環節。可見，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要打造先進精神文化，關鍵在於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其先進的核心價值理念，在傳統文化精神中探尋並建構大灣區作為一個特定區域必須思考和處理的人與經濟、人與自然、個人與世界、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係。

先進的精神文化與科學發展觀構成一體兩面的關係。我國“南漂藝術”堅持以工業文明作為藝術的核心精神，堅定藝術為人民服務的方向，這為其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北漂藝術”則在創作上模仿西方的藝術形態，市場也主要面向西方買家。約瑟夫·奈在研究美國軟實力時指出，美國受益於其普適性的文化。²⁹建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基礎上的粵港澳大灣區精神文化，將體現

大灣區作為新時代國家戰略的內涵與品格,成為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靈魂,這有助於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範。

(2)具有區域發展特色的精神。對於一個區域或城市的生存和發展而言,精神文化是靈魂支柱,具有導向作用,不但能夠對內凝聚人心、對外樹立形象,而且也是團結一致、共謀經濟發展的精神源動力。由此,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自己的精神文化,除了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還必須將大灣區發展價值、歷史傳統、時代特徵、精神面貌與嶺南傳統文化相融,創造性地挖掘嶺南傳統文化的當代魅力與當代價值,同時注重吸收外來先進價值理念,由此提煉具有區域發展特色的精神,塑造區域性的精神價值體系,培育內生的發展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人文精神中向來具有多元包容、開放創新、務實進取等突出品格。深圳改革開放後形成的“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深圳精神”就是一個典型。這一精神植根於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孕育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創新精神,與科技、商業一起成為深圳人民在新時期開創新事業的最重要精神動力,吸引着中國與世界的人才與資金趨之若鶩。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涉及兩種不同的制度與文化,實際兼容了多元的文化價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要充分利用並凸顯這樣的多元文化價值,形成自身發展的獨特的精神文化支撐。

3. 實現從文化產業到文化軟實力要素的轉化

《規劃綱要》中2處提到“文化產業”,6處提到“文化創意”。文化產業屬於第三產業,又稱為創意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服務)的過程。就產業鏈而言,文化產業的開發和運營一端連着文化資源(軟實力要素),另一端則連着經濟發展(硬實力要素),本質上是文化資源依靠特定方式進行優化配置,實現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從而將積澱下來的文化價值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提高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力和影響力。可見,文化產業雖然本身並非軟實力要素,但其實現過程兼具軟實力和硬實力雙重特性,表徵的是文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雙重要求,能夠實現從軟實力要素到軟實力的轉化,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軟實力資源的輸出渠道。或者說,在物質層面,軟實力的提升主要是通過文化產業來實現的。文化產業是國家文化資源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形態,反映着文化要素稟賦的特色和風格,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基礎性資源。^⑩這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提升區域軟實力的邏輯條件。2012年,英國能夠擊敗美國榮登世界軟實力國家排行榜榜首,原因正是在於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

事實上,在後工業時代,伴隨着文化消費的迅猛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和動力源。世界四大灣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結構已經相對穩定,且各具特色。我國國家“十三五”明確規劃,2020年文化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儘管如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結構仍然以產業價值鏈後端為主,處於利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數量等相對優勢發展低端文化產品、裝備生產類文創行業的階段,因而不斷被社會需求、技術發展、規劃要求等因素重塑。美國學者邁克爾·巴爾認為,振興文化需要對文化產業進行新的投資。^⑪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產業如果要在宏觀視野中實現文化軟實力要素的轉化,就需要不斷優化升級,向價值鏈高端延伸和躍遷。

(1)堅持本土文化特色,實現多元化布局。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正是由於文化獨特性,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獲得了軟實力獨特性。這顯然符合軟實力經典概念對軟實力要素的質的要求。為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發展需要通過頂層設計,堅持將作為當地文化之根的傳統嶺南文化落地,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新興文化創意產業模式。粵港澳大灣區不但文化資源豐富,而且

是中國現代流行文化的先行者,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一直佔據重要地位。在堅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實現多元化的文化產業布局,構建“整體”中的異質性文化產業發展圖景。同時,粵港澳三地各城市要錯位發展,避免惡性同質競爭,不能沿襲缺乏歷史文化內涵的千城一面的時代俗套,共同打造既迎合嶺南整體文化性又具有各自獨特文化品牌的文化創意產業生態系統。

(2) 推進文化創意創新發展。當下時代,創新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文化產業賦予文化以新的角色,以文化作為原材料“可持續”性地推動經濟發展。這就需要文化產業必須堅持文化創意創新發展的理念,通過創意創新,打造文化品牌,建設新文創體系。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同樣如此,要以創意為抓手,以現代科技為手段,以現代都市人的需求為導向,促進各種創新要素在優化互補的基礎上不斷吸納新的創新要素,形成縱向層級豐富、橫向連接廣泛的全球性文化創意產業體系。

(3) 重視文化產業制度建設。為了推廣創意概念,英國制定出配套的政策體系和市場準入機制,通過稅收、培訓等方式加強對文化產業的引導和扶持,使得文化產業很快走上了振興經濟的正軌。可見,文化產業的健康和有效發展,離不開健康有效的文化產業制度的支持。世界四大灣區的文化產業發展進程都證明了這一點,舊金山灣區更形成了穩定的多核心城市聯動協同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必須重視文化產業制度建設,積極推動文化產業體制的機制創新,完善文化創意創新的支持體系。首先,需要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文化生產方向的機制;其次,建設必要的機制和平台,例如完善的文化市場、強大的文化產業和文化支撐組織等,對大灣區各城市進行科學的文化創意產業規劃布局,以便發揮各自的優勢特色,形成產業協同效應,從而能夠將大灣區文化資源的突出優勢轉化為現實的軟實力優勢;最後,掌握並遵循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法規,以便能夠在創意產業的世界範圍內獲得生存與發展。

文化資源絕對是一個富礦。除了以上幾點外,文化消費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文化消費的構成、模式、環境、潛力、市場活力等的質量,都關係到能否推動面向國內外企業和個人的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文化消費快速而健康地增長,從而促進大灣區文化產業的發展與繁榮,並由此推動大灣區軟實力建設。這些都涉及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人才的匱乏。事實上,這已經嚴重制約着我國文化產業整體的持續發展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

三、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營商環境資源

軟實力不是政治口號,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合與動力推進,政府往往通過塑造政策環境間接地發揮作用。^②這種由政府及相關機構主導營造的政策環境就是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或行為文化,體現的是一個區域的政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管理能力和專業化水平,能夠強烈影響企業投資行為和經營行為的長遠規劃,從而不斷增強市場主體活力,給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預期,提高企業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可見,營商環境本質上是一種軟實力要素。^③準確地說,營商環境是一種社會環境軟實力要素,具體表現為政府公信力和社會和諧力在保障或技術層面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區域軟實力的基本要素。

良好的營商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定海神針”,但其意義遠超經濟領域,對文化資源、文化產業和國民素質乃至整個區域軟實力都具有調控和統攝作用。國際商務領域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營商環境優劣,對人才、企業與投資的區位選擇決策具有顯著影響。世界銀行發布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則說明,全球資本和貿易尋找良好營商環境的本性一直都沒有改變。在全球

化背景下,營商環境作為一種重要軟實力要素的競爭是全球性的,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此,《規劃綱要》中7處提到“營商環境”,要求大灣區“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優化營商環境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市場要素、經濟秩序、行政體制、社會氛圍等經濟社會層面。制度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政策,包括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在一個優良的營商環境中,法治環境應該公平公正,體制環境生機勃發,市場環境寬鬆有序,服務環境高效透明,信用環境誠實守信,社會環境安全和諧。在操作規範上,優化營商環境目標在於實現營商環境在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前提下的便利化。營商環境建設必須站在全球產業競爭的高度,與國際通行的營商慣例與制度接軌。國際制度是確立合作和協調途徑的制度化方式,有利於降低國與國之間交易的成本,減少不確定性帶來的誤會與衝突。約瑟夫·奈指出,如果一個國家能夠使自己的力量被他國視為合法,並建立促使他國以和諧方式確立其利益的國際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他國家那樣耗費昂貴的傳統經濟資源和軍事資源。³⁴可見,國際制度能夠發揮軟實力資源效用。

在實踐中,舊金山灣區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但政府的支持和引導仍然不可或缺,在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環境營造、高校和科研機構基金支持、訂單和研究項目委託、優惠投資、鼓勵創新、高等教育生態系統建設、人才吸引等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政策與法律保障機制。舊金山灣區1945年就成立了由企業贊助的灣區委員會,專門解決灣區面臨的各種問題。東京灣區保持“誰開發誰擁有”的基本原則,並成立“東京灣港灣聯協推進協議會”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採取會議協調協商方式進行解決,牢牢依靠並堅守規劃,確保灣區建設的長期性和協同性;建立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完善資本市場拓寬融資渠道等措施,為東京灣區科技創新提供人才和資金保障。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利用營商環境資源實施軟實力建設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宏觀上要立足於中國國情與大灣區特徵,同時借鑒世界其他灣區的經驗與教訓,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以大灣區整體規劃為契機,提高政府的服務效能和透明度,創造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協調開放、競爭有序的良好營商環境。港澳與內地城市在法律、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着較大差異,需要中央政府統一協調布局與政策引導支持,建立填補三地差異的統籌和協調機制。有學者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關鍵在於打破體制障礙和行政區域限制,以便於全要素流通、區域分工合作,形成三地文化優勢互補、資源有效配置、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跨區域發展新格局。³⁵發揮民間團體、行業組織的協調作用當然重要,但還需要法治監督和保障,以維護安全的營商環境。

習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法治對於突出強調平等與自由價值觀,提高社會凝聚力,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同度,都具有重要意義。法治環境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軟實力要素。2019年國務院頒布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使得政府在全力推進優化營商環境時“有法可依”,從而制度化地消除痛點,激活創新。《規劃綱要》則明確要求“加強粵港澳司法交流與協作,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務和保障,着力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這就從制度層面為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提供了更為有效的軟實力資源。

四、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生態環境資源

生態環境不僅是一個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文明程度的指標之一。從這個角度說,生態環境就是一種文化,是軟實力的一種基本要素。有學者指出,環境之於人和社會,原本就是一種資源,構成了國家社會謀求可持續生存發展的基礎性、動力性

軟實力。³⁸可見,環境能力是構成國家軟實力的基礎力量。³⁹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應該是生態環境體現為軟實力要素的生動詮釋。現實中,優美宜居的生態環境已經構成區域的一個重要吸引力和自身形象的影響力,成為區域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既助推區域性的社會經濟發展,帶動文化旅遊產業融合發展,又能夠吸引區域外的優秀人才與投資。

世界四大灣區的共同點是不僅擁有豐富的環境資源和獨特的地理生態,而且在科學規劃下造就了優質的人文氛圍與人居環境,形成了巨大的人文經濟價值。優美宜居的生態環境一直伴隨並推動着舊金山灣區的經濟發展,強烈吸引着全世界有着生態宜居和生命健康需求的一流人才居住、工作與創業,也吸引着高等教育機構和科研院所所聚集,不僅帶動硅谷發展出具有規模效應的高科技產業,也帶動周邊城市群發展。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視保護自然環境,出台了相關法律和政策嚴格控制污染,有效地協調了經濟發展、城市開發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日本東京灣區則在開發建設中一度付出了沉重的環境污染代價。在 20 世紀世界環境八大公害事件中,四件就發生在日本。嚴重的環境污染還引發了嚴重社會危機。為此,日本政府先後出台了多種嚴苛的環境保護法規,大力治理灣區的產業污染,經過 30 多年努力才獲得成效。

環境軟實力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思考、認知、審查環境的一種新方式、新思想和治理環境的新理路、新方法。⁴⁰以東京灣區為代表的高污染、高碳排放、高耗能等造成的環境問題反映的是“先污染、後治理”或“只發展、不治理”的環境觀。這種環境觀扭曲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根本不是一種以可持續生存為規範、遵循自然規律的發展觀,後果非常嚴重:環境惡化問題在嚴重限制區域硬實力進一步增長的潛力與空間的同時,極大擠壓了區域軟實力的運作空間。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理念納入國家現代化發展目標,認為生態文明建設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作為國家軟實力發展戰略的區域落實,“必須注重並促進生態資源的建設”,⁴¹力爭從生態環境資源層面推動大灣區軟實力的整體提升。事實上,《規劃綱要》中 11 處提到“生態環境”一詞,3 處提到“生態文明”一詞,並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一章專門就大灣區的生態文明建設進行規範和指導,指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為此,要從整體上堅持以生態文明建設為主導,堅持以優美的自然環境促進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同時帶動中國向世界展現生態文明的轉型之路。在具體操作上,則要在明晰產權等市場機制運作、正確把握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關係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協同推進生態優先和創新綠色低碳發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

區域性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忽視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必須建立應對威脅人民健康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的應急響應機制。2020 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同國家或城市應對和處理這一全球大流行疫情的能力與效果,反映出該國家或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水平狀況,對其自身形象和軟實力有着重要影響。

五、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人口素質資源

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認為,民族性格和國民士氣是影響國家實力的突出因素。⁴²這就涉及國民素質的軟實力資源屬性問題。根據軟實力經典定義,人顯然不是軟實力的基本要素。然而,人是國家具有主體性質的活力系統,國家的文化精神和氣質主要就體現在國民的個人或集體表現中。可見,人是軟實力要素的創造者、踐行者與傳播者,正如有學者所說,每一個民眾都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微觀元素。⁴³由此,人口素質成為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是“國家軟實力的動力”。

人口素質包括公民的文明素質、知識技能素質、精神狀態、意志品格等，最終表現“就是公民的社會關懷能力和政治關心能力”。^④對一個城市而言，每一個市民的素質對內直接影響市民參與城市管理的態度、水平和能力，影響政府改革政策的實施效率，從而影響城市的競爭力，對外則直接影響所在城市體現為吸引力與凝聚力的軟實力質量。可見，人口素質是一個區域或城市內化的文化，比外化的文化更具現實意義。事實上，國際上許多大城市在設計 21 世紀城市發展時，都把人的發展放在城市發展的首位，強調都市圈建設中人的因素。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也是如此，人口素質從根本上決定着大灣區建設的成敗。為此，《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進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養與社會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豐富灣區人文精神內涵”。

1. 人口的文明素質

素質在哲學層面是人性的基本方面與根本表現。人口的文明素質主要指與現代社會發展和現代文明建設相適應的人的內在素養，是人在文化素質、政治思想、道德意識、法治意識、科學素養、理性精神、責任意識、獨立人格、生態意識、可持續發展意識、世界一體意識、經營能力、身體素質等方面達到的認識社會、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能力和水平。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公民如果沒有文明素質，經濟再發達，也不能贏得尊重，也就無法產生軟實力。

文化素質是文明素質的重要表現，而社會的文明程度總體上與國民的文化素質呈正相關關係。學者指出，歸根到底，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強弱在其國民文化素質的高低。^⑤文化只有為人所掌握並體現出來，才能生發力量。鑒於“文化”在軟實力資源中的核心地位，大灣區軟實力建設要注重將嶺南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轉化為人口的文化素質。區域軟實力在行為層面，主要就表現為市民心理和行為對城市文化的傳承與認同。大灣區公民需要文化自覺，即如著名學者費孝通所說，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同時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⑥這種文化認知態度有利於推動大灣區軟實力建設戰略。

2. 人口的知識技能素質

人才科技是創造力和科技創新力的集中表現，核心就是體現為知識技能素質的人力資源。大灣區人力資源的數量和結構決定了自身能否完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發展轉型與升級的基本任務，從而推動大灣區發展。在世界四大灣區中，舊金山灣區的勞動力素質最高，超過 40% 的灣區人口擁有學士或更高學位。這些掌握和應用科學技術的科學家、工程師和專業技術人員是發展科學技術的核心，使得硅谷創新型經濟產生了巨大競爭優勢。東京灣區一直重視通過人才培養推動科技發展。1980 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學技術立國”的發展戰略，先後頒布多部推動科技發展的法律法規，進行灣區科研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體制改革，培養或吸引驅動創新的科技人才。

現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內拔尖人才匱乏，領軍人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高技能人才都普遍緊缺，同時面臨着大規模的面向高科技產業、先進製造業、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文化產業、時尚產業等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人力資源結構優化與轉換。為此，《規劃綱要》強調了“建設人才高地”的重要性，支持採取“建設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試行技術移民”、“建立國家級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建立緊缺人才清單制度”、“完善外籍高層次人才認定標準”、“完善人才激勵機制”等各種手段，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引進人才環境，實行更積極、更開放、更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大力引進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參與到大灣區的建設和管理中來。

3. 科學教育事業

大灣區軟實力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人口文明素養。教育是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

也決定了城市人口的文明素質程度。發展教育不僅能為本地居民提供良好發展基礎,成為維持城市不斷發展的動力,也能夠吸引外地人才求學、定居或工作。德國作家 Joseph Joffe 指出,美國向其他國家展示的不單是強大硬實力——最先進的槍炮、艦船和飛機,還有無孔不入的軟實力——哈佛、好萊塢、麥當勞和微軟。⁴⁵在他看來,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高校自身就是一種軟實力資源。

從世界範圍看,舊金山灣區成功發展的一個基礎條件正是一批高質量大學擁有的教育優勢和人才儲備。這裡有着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環境,以及領先全美的公立高中系統,吸引了超過百位諾貝爾獎得主求學或工作(截至 2018 年 10 月),而正是斯坦福大學推動了硅谷的興起。紐約灣區則是東部教育重鎮,坐落了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 58 所高校。東京灣區同樣如此,擁有 263 所高等教育機構(2013 年統計)。事實上,東京灣區產業迅速發展的秘密武器正是教育資源和創新資源。多類型、多學科、多層次的大學集群和科研機構,不僅能夠為灣區企業培養並輸送大批優秀人才,為科技創新提供智力保障,而且能夠為科教與產業循環驅動帶來增強效應。

《規劃綱要》中 26 處提到“教育”一詞,要求大灣區“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大力“推動教育合作發展”:一方面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充分發揮粵港澳高校聯盟的作用,同時支持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則鼓勵推進粵港澳職業教育與基礎教育的交流與合作。這些理念與措施顯然切中了大灣區當下創新人才與國際化人才短缺的矛盾。截至 2019 年 3 月,粵港澳大灣區分布有近 150 所高校、43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在艾瑞深校友會網 2020 中國大學排名中表現突出,綜合實力持續上升,發展勢頭強勁。其中,8 所高校位居 QS 世界大學排行榜 500 強,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 5 所大學入選 2017 年國家公布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不含香港、澳門)。2016 年 11 月,粵港澳高校聯盟成立,迄今已匯聚粵港澳三地 28 所高校,旨在面向國家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推動教育的制度化合作發展。然而,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創新能力與舊金山灣區等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創新效率低,技術轉移環節也弱。如何“一盤棋”地活用大灣區內高等教育資源,加強創新人才與國際水平科技人才的培養,加強科技成果的轉化機制建設,打造人才高地和教育高地,任重道遠。

六、結束語

軟實力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粵港澳大灣區軟實力建設的資源能否真正提高區域軟實力,成為大灣區保持世界魅力的加速器,不僅需要各項資源儘快實現優質性轉化,也離不開系統內強而有力的運作機制,正如約瑟夫·奈所說,就達到目標而言,將資源轉化為真正實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領導藝術。⁴⁶這其中,智庫與宣傳尤其重要。重視並發揮智庫的作用,打造具有延續性的智庫體系,正是東京灣區的發展秘訣。智庫對該地區有着長期而深入的研究和認識,對整個灣區的開發有着整體把握,因而能夠充當各種規劃的銜接者,在制定規劃時提供更為全面的智力支持。事實上,東京灣區在開發建設中,所有規劃的銜接不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完成的,而是由各種智庫居中協調實施的。可見,智庫正是東京灣區開發管理的一個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軟實力資源作為一種與硬實力相對應的存在力量,只有在宣傳與傳播中才能讓人深刻感知,並發揮其作為一種實力的意義和價值。王滄寧指出,軟實力力量來自擴散性,只有當一種文化廣泛傳播時,軟實力才會產生強大力量。⁴⁷邁克爾·巴爾也認為,軟實力有效與否取決於行為者在特定團體中的信譽以及行為者之間的信息流動。⁴⁸這就需要我們構建有效而科學的宣傳體系,充分利用甚至創造各種國際活動與國際平台,在全球範圍內形塑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與精神文明形象。

- ① 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頁、第14頁。
- ② 布蘭德利·沃麥克：《“軟實力”評析》，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5期。
- ③ 約瑟夫·奈、張哲馨：《自由主義化的現實主義者——對約瑟夫·奈的訪談》，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8期。
- ④⑮ 陶一桃：《中國道路的又一偉大實踐——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4期。
- ⑤⑦⑬⑱⑳㉔④⑥ 約瑟夫·奈：《軟實力》，馬娟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4頁；第15~16頁；第15~16頁；第16頁；第16頁；第133頁；第6頁。
- ⑥⑨⑳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72頁；第72頁；第74頁。
- ⑧ Tatjana Sehic, *Soft power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capital of roots and wings*, Verlag: United p.c., 2013, p.24.
- ⑩④⑦ 王滄寧：《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上海：《復旦學報》，1993年第3期。
- ⑪ 辜勝阻：《中國經濟轉型需要重塑創新創業文化》，網站：搜狐財經，2006年1月10日。
- ⑫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 & Studies*, 2008, 44 (2).
- ⑬⑳⑳⑳⑳ 唐代興等：《軟實力的學科定位及發展藍圖研究》，見《軟實力研究論叢》，2012年第1卷，濟南：濟南出版社，第87~99頁。
- ⑭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18.
- ⑰⑳⑳⑳⑳ 沈壯海：《文化軟實力及其價值之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頁；第123頁；第5頁；第7頁。
- ⑲ 楊慧民、胡靜：《關於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哲學思考》，見《軟實力研究論叢》，2012年第1卷，第80~86頁。
- ⑳ 肖歡：《國家軟實力研究：理論、歷史與實踐》，北京：軍事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21頁。
- ㉑ Joseph Nye,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 *Asia Pacific Review*, 2002, 9 (1).
- ㉒ 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5頁。
- ㉓ 約瑟夫·奈：《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吳曉輝、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 ㉔④① 趙學琳：《文化產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科學機理》，見《軟實力研究論叢》，2012年第1卷，第173~181頁。
- ㉕④⑧ 邁克爾·巴爾：《中國軟實力：誰在害怕中國》，石竹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頁；第10頁。
- ㉖ 閻海峰：《營商環境是上海參與全球競爭的軟實力》，上海：《第一財經》，2019年2月28日。
- ㉗ 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3頁。
- ㉘ 施詩：《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高地》，廣州：《南方》，2018年第288期。
- ㉙ 唐代興：《環境資源、環境軟實力與環境資源代際儲存——“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境國策與戰略思路》，成都：《黨政研究》，2014年第5期。
- ㉚⑳⑳ 唐代興：《環境軟實力：探討環境治理的新視角》，昆明：《思想戰線》，2015年第4期。
- ㉛ 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徐昕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75頁。
- ㉜ 唐代興、陳晴：《國家軟實力的構成及其功能體系》，見《軟實力研究論叢》，2013年第2卷，濟南：濟南出版社，第57~67頁。
- ㉝ 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 ㉞ Joseph Joffe, *Soft power politics*, *Time Europe*, 2000, 155 (23).

作者簡介：陳偉，暨南大學翻譯學院教授、中國文學文化外譯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珠海 519000

[責任編輯 劉澤生]